# 目　录

从川东游击军到红三十三军……罗　忠（1）
我南下入川的经过和初到绵阳的一些观感……赵继英（13）
在四十年代省绵师的学生运动……绵阳市中区党史办（24）
我对绵阳联女中生活的回忆……赵国秀（30）
留法勤工俭学的回忆……张仲绒（38）
绵阳的儒学、书院、义学与私塾
……绵阳市中区文教局供稿（42）
绵阳南山中学沿革……王国宁（54）
绵阳农业专称学校沿革和现状……绵阳农专（58）
解放前绵阳的育得中学……宋耀汉（62）
绵阳南山小学建校初期回忆……庄开泽（65）
献身教育事业的余必达老师……张承恩（70）
一九四九年以前绵阳民众教育馆的概况……陈明极（73）
绵阳旧日艺林琐忆……马伯平（76）
绵阳明、清戏曲活动考……陈永乐（80）
一个工程人员对旧社会感受的倾诉……魏怀枢（96）

# 从川东游击军到红三十三军

罗　忠

大革命失败后，四川的地下党按照中央临时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确定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四川省委当时着重在川东开展工作，川东一带的领导当时是戴治安、张鲤庭等同志，后来，王维舟同志从武汉也回到川东。川东党根据重庆四川省临时地方委员会的决议，迅速在万源、忠县、石柱、丰都、涪陵、开江、开县、梁山、大竹、城口、达县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成立川东特委统一领导川东地区党的活动。王维舟同志回来后，很快发展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培养了大批骨干。一九二七年八月，重庆临时委员会选举王维舟同志为重新组织的中共四川省委临时委员会书记。同时，为了贯彻中央的“八、七”会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组成了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王维舟同志任书记，并且成立了川东游击军，王维舟同志任军长兼军党委书记。

川东游击军的另一领导人是杨光明同志。他原姓陶、名洪尔，化名洪涛，一九〇五年生于四川涪陵，二一年就读于涪陵中小学合校，二四年共青团省委的负责人在涪陵宣传革命道理，促使当地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逐步兴起。杨光明在校期间，便积极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中学毕业以后，

便走上了革命道路，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光明同志为人谦虚谨慎，生活作风艰苦朴实、处理问题明确果断，对同志热情诚恳。一九二六年党派他到涪陵、丰都、石柱、忠县等地工作。在深入农村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三〇年他到川东游击军，负责发展农会，组织农民武装。他到任后，即将綮山、达县中心县委机关转移到达县蒲家场（因他仍是中心县委书记）。蒲家场当时属川东游击军活动区域，这样，加强了川东游击军与地方工作的联系。

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用一个破烂的油印机和一块钢板，编印了油印小报《战鼓》，还经常深入农村、矿区，指导各地党组织的活动，由于他工作深入，有时一夜走一百多里路，故有“铁脚板”的绰号。

川东游击军的另一领导李家俊，化名陈国泰，一九〇三年生于万源一个地主家庭，他有热情，好勇任侠，喜与人交往，同情穷苦人，一九一九年考入达县中学读书，常接济贫困同学，被其父称为“败家子”。“五四”运动后，李家俊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常邀集同学研究时事，抨击封建主义，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考入上海同济医学院。他不断努力追求革命真理。一九二四年得了较重的肺病，返回家乡，却并未养病而是创办小学，实施新文化教育。当地反动阶级对他极为不满，遂由县教育局长出面百般刁难。为回击敌人，李家俊在获悉这位教育局长有鸦片烟瘾时，便组织青年多人，趁他卧床抽烟时，将他扭送到县署，并和“县太爷”在公堂上吵起来。这位“县太爷”竟以“咆哮公堂”为名把李家俊投入监狱，年余后方出狱。一九二五年，王维舟同志亲自介绍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组织农民起义，他把全家老小十余口人迁到开江县普安场隐居下来，把自己家中的谷米和田产全部分给当地农民，并当众烧了地契，他的行动深得农民群众的赞扬和拥护，农民武装很快组织起来了。

## 川东游击军产生和发展的经过

川东党军委在王维舟等同志领导下，认真研究了当时川东地区的形势，选择达县、万源、梁山、城口等县的边界地区为重点，因这一带有群众基础、地处边远、适合对敌斗争。川东党军委成立了以李家俊为组长的武装斗争领导小组，康伯亚、雷玉书为副组长，康、雷到川东党军委领回驳壳枪二十一支，带领三十余人回固军坝，还通过党的内线关系，从开江运回一批枪支弹药，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待考），川东第一面武装革命的红旗在万源、达县交界的固军坝竖起来了。是日固军坝白洋庙和达县的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武装斗争小组和铁矿坝工人武装斗争小组以及梁山、开江动员来的工会会员等等，汇集在固军坝附近的龙潭河，宣布成立了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即支队），李家俊为司令，康伯亚为政委、雷玉书为副司令，这支部队成立后，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于二九年十一月初，趁敌不备，突烈袭击了白洋庙的守敌，击溃了敌廖雨辰部第三团一个营，毙敌排长以下数十人。游击军副司令雷玉书在战斗中负伤，后来牺牲。敌人慑于游击军的声势，纷纷后撤，游击军收复了白洋庙，固军坝等地。这时，敌不甘心失败，军阀刘存厚又令廖雨辰部向固军坝围攻，川东游击军正确地运用了游击战术，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转移，仍然十分活

跃。同时由于不断转移，川东游击军与四川省委失掉了联系。李家俊、胡洪仁受川东军委委派，到重庆寻找省委汇报，并请示下一步工作。省委派了李哲生和王国良二同志前来游击军指导工作。从此后，游击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游击活动，游击军第一路迅速发展到三百余人枪。

川东游击军是在与敌人战斗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武装。这支武装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攻以后，到处贴标语，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土豪劣绅，二九年五月，游击军在乾坝子捉住了敌万源县公署的收款委员梁全武。把他所携带的赃款全部缴获，又乘五月十二日敌人换防的时候，夜袭的白羊庙，击溃刚刚调来的敌刘存厚部第三路第九团的第六连，摧毁了敌万源县第三区办事处，活捉反动区长王缓之及土豪劣绅数人，接着消灭了当地的反动团练，占领固军坝。游击军将这些反动分子交群众大会公审后枪决，并开会济民、分土地、成立县区农会。从此，在万源、定汉边界逐步建立起以固军坝为中心、纵横四十余里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由于固军坝起义和战斗的胜利以及刘存厚的第一次围攻没有奏效，刘存厚又调三个团对固军坝，白羊庙等地的游击军进行第二次围攻。并大肆烧杀抢掠，厚坪、潘家沟、黎台山等村全被烧毁。在厚坪挖了李家俊的祖坟、烧了房屋，仅管敌人非常疯狂，但就是找不到游击军的主力，而这时川东游击军以逸待劳养精蓄锐，避开了敌人的锋芒，在龙潭河新开辟了根据地，办了干部训练班，在战士中抽了一部分青年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敌人后来探知，李家俊率领游击军在龙潭河一带，终因龙潭河一带树林茂密、山势险峻、沟谷纵

横而只好叹息，不敢妄动，唯一的办法是围困。经月有余，我们游击军发现围山之敌已疲备不堪，于十一月乘敌不备，突然绕道袭击了白羊庙之敌，击溃廖雨辰第三团一个营，缴获枪支八十余支，毙敌数十人，生俘敌营副以下官兵十余人。这是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成立后取得的第二次胜利。

二九年底，刘存厚又从定汉调来第二师吴建臣团再次向固军坝发动进攻。为粉碎这次进攻，川东党利用了敌第二师内部我党的秘密关系，打入敌第二师内部的共产党员冉南轩等在党的指示下，于定汉城南天生桥发动了两连义兵的起义，同时，共产党员李光前等在定汉城南王家场和明月场等地发动了游击战与冉呼应，加之川东游击军第一路这样三支武装对定汉城形成了严重威胁，敌二师为巩固老巢，遂将吴建臣团调回。冉南轩率领的二个连起义部队后编入川东游击军第一路。

三〇年一、二月间，川东的颜德基部和独立旅王光宗部因对刘存厚的排挤不满而发动了倒刘战争，曾一度占领万源城。我川东党乘敌人军阀之间混战之机，又发动了驻涪陵之敌郭汝林部内的以地下党员李鸣珂为领导的两连士兵起义。川东游击军第一路也发起攻击，一举占领了万源的石唐坝，攻下了官渡场来配合李鸣珂的起义部队。李鸣珂率领的起义部队在涪陵同当地的农民武装后来组成了川东游击军第二路。原起义部队连长赵启明任司令，李明珂任前委书记。第二路主要活动在长江以南和第一路形成南北呼应之势。从此川东游击军声威大振，部队日益壮大。

颜德基、王光宗发动的倒刘战争很快归于失败，颜、王二人被刘赶出四川，投西北军去了。这时，刘存厚又积极筹

备力量，集中兵力向固军坝地区的游击军第一路发动围攻。所到之处成立“清共团”，实行并村、连坐、妄图以此消灭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游击军采用游击战术，时聚时散，机动灵活神出鬼没，不断给敌人以打击，据当时有的报载：游击军曾攻占城口县城，将守敌刘耀乡团缴械，击毙城口县长，并将各乡的土豪劣绅数十人交农民协会严惩。等等。但总的说来，第三次反“围攻”的工作并未全面开展起来，原因也是此时接到四川省委要川东游击军东进的命令。

## 川东游击军两次奉命东进受严重挫折

川东党军委领导的这支游击军，从二九年到三〇年经过整整一年的艰苦斗争，眼看着成长壮大起来。川东党军委正拟依靠这支部队，以井岗山为榜样，在宣汉、万源、城口边界逐步建立起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然而，这时党中央领导正在走向左倾冒险主义。《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上半年间，在党内存在着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有利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左”倾路线。在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由于中共四川省委执行了当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路线，不仅打乱了川东党军委的原计划，而且使游击军遭到两次严重挫折。

## 一次是游击军第一路革命东调遭到最重挫折

三〇年夏，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为了执行中央指示，实行所谓“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乃命令川东游击军第一路集结东调，向湖北进军，会师武汉。同时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司令李家俊等人调省委工作，并决定李参加省行动委员会，同年十月任省委书记（实际是江北、巴县中心县委书记），李十月上旬去江巴中心县委与组织部长杨仁杰联系时，叛徒认出、杨被捕，李家俊乘茶馆混乱之机逃出。不久后，李又去合川检查工作，回来的路上被叛徒出卖，不久李、杨二同志均被军阀王陵基杀害于重庆罗家湾。这样川东游击军的领导被削弱了。此后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在康伯亚的率领下，由固军坝出发，途经湖北竹溪、房山，不断遭到伏击、堵截到了房山，被敌包围，游击军在康伯亚等率领下反复冲杀、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绝大多数指战员英勇牺牲，少数人突出重围。

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受挫后，四川省委和川东军党委决定重建革命武装，在开江县人市铺、广福场、梁山的虎城场、太平场一带发动第二次游击战争。三〇年冬季，王维舟同志等到广福场与当地中学校长蒋群麟配合开展工作，组织农会，得到进步团总李介眉的同情和支持，并通过他的帮助，买到不少枪支弹药，后被敌人发觉，李介眉便带队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加上王维舟等同志领导的农民武装和一些我党掌握的壮丁队，共拥有六百余人、三百余支枪。

就在这时，四川省委的贯彻“左”倾路线，不顾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失败的教训，又命令刚成立起来的这支队伍连同

党在当地掌握的其他农民武装，一起南渡长江再度东进，计划到湖北建始、恩施等地与我红二军团合师“包围武汉”，于是这支武装随即南下，在忠县西北的黄钦场，与共产党员李光华掌握的太平乡壮丁队和王贯一掌握的壮丁队会合，这三支武装合并了会师大会，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当时又称川东游击纵队），李光华的司令、王维舟兼副司令，纵队下编三个大队，同时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这时全部人枪逾千。

川东游击军第三路成立不久，在花桥寺击溃敌一个营的守军，并占领花桥寺。之后，一面整顿队伍，一面开仓分粮。当时对于游击军的行动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是以王维舟为代表的同志认为：部队成立不久，缺乏训练，思想不够稳定，新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不宜远征，应接受第一路失败的教训，暂缓东进，但是，以省委代表牛大鸣为代表的同志，则认为一个中心城市的胜利即一省的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即全国的胜利。并强调包围武汉意义重大，这是中央的决定，必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王维舟同志建议即便必须执行“包围武汉”的任务，也必须留下部分队伍坚持游击战争。这些宝贵的意见未被采纳，会议经过三天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通过了东进的错误决定。

三〇年深秋川东游击军第三路途经马家坝、三江填，向东进军，在九亭击溃反动民团数百人，由石宝寨渡江，进抵对岸的石柱县边界沱，这时原来活动在涪陵以南的川东游击军第二路一部在赵启明的率领下前来汇合，继续向东南进发，经南木亚至西罗坪，此时，敌陈兰亭的部队已尾随赶来，将游击军第三路包围，经三昼夜激战，最后游击军弹尽

粮绝，受到严重损失，第三路司令李光华，第一大队长李次华（李光华之弟）等负伤被俘。只有三百余人在王维舟同志率领下突出重围返回梁山、达县边界地区。李光华兄弟后来都英勇就义，表现了高尚的共产党员气节。

## 川东游击军在艰苦斗争中恢复发展

王维舟同志率领的三百余人从西罗坪突围回到梁山、万县等县交界的山区之后，选中了地处深山老林，山势险峻的百里槽作为根据地，这里易守难攻，加之有群众基础，所以很快便站住了脚。王维舟同志将剩下的这三百余人分为三路，一路向梁山开展，一路向方源开展，一路向开江开展，从三路工作的情况中了解到敌人占领固军坝、白羊庙等地后大肆抢杀烧，给群众造成很大损失，另一方面了解到地主武装和叛徒对革命发展是个很大的阻碍。为此，在王维舟同志的领导下，当时主要做了四件事：①开展武装斗争，发展游击战，有力打击地主武装，严惩叛徒；②大力宣传“打富济贫”和我们党的土地政策，工作队所到之处，均要开仓分粮；③时刻提高警惕，加强了情报工作；④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了数十名党员。

一九三一年，四川省委决定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并决定由王维舟同志任川东党军委书记兼川东游击军总司令，总指挥部设达县东南的芭蕉场附近。

总指挥部成立后，即着手整编工作，以原有的三个小分队为基础，成立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梁山县委书记蔡奎任支队长，第二支队由达县县委书记熊长吉任支队长，第三支队长由王维舟同志自兼。经三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和武装小组

惩办了一些最反动的土豪劣绅和叛徒，到三一年夏、秋梁山、宣汉、达县、开江、万源等地的革命力量似春草一般发展起来。到三二年初，四川省委决定，将梁山、万县中心县委改建为梁山、达县、万源、宣汉中心县委，杨光明任中心县委书记，为工作需要，中心县委机关转移到达县城北的蒲家场，工作重心由白区转移到游击区，这样一来，川东党军委和中心县委便取得了更密切的联系，武装斗争和地方党的工作进一步取得了更密切的配合，游击军总部为广泛的发动群众决定以各支队为单位，分头扩大游击，这时的工作进展很快，月余后，各支队均有较大的发展，其中，第一支队发展最快，但是由于部队扩大时警惕性不高，支队长蔡奎等三十余人被混进支队的炊事员（原是富农）所出卖，在去百里槽北面一个村开展工作时，敌人突然将他们包围，蔡奎同志等三十余人均壮烈牺牲。

正当川东游击军胜利发展，游击根据地日益扩大巩固的时候，刘存厚、刘湘两军阀又联合对川东游击军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围攻。刘湘派住涪陵的陈兰亭师两个团，和驻梁山王赞绪师两个团，刘存厚派他的第二师两个团，共六个团的兵力，分别驻守在梁山县城、达县、万源、开江等县的重要乡镇，把守各乡镇的敌人更加疯狂。然而，由于川东游击军正确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敌人往往扑空，到处找不到我们的主力。一天，我游击军总指挥部在芭蕉场贺直三家已开会，被敌人探知，总指挥部迅速转移，敌人将贺直三等人抓去严刑拷打，终一无所获，在贺直三等人被关押期间，贺直三的儿媳贺张氏接着为我做了大量工作。

三二年八月的一天，游击军获悉刘存厚的表弟陈文甫

（也是刘存厚下属的团长）在一连人的掩护下，乘船到达县去给刘存厚祝寿，带有大批礼物。游击军决定打一个伏击，任务由第一支队执行。此时的第一支队长是冉南轩同志。将一、二大队事先埋伏在预定地点，然后率四十余人装扮成廖雨辰师部的通讯参谋陈某，称到达县给刘司令送重要情报，必须刘司令亲阅并亲笔回信。陈文甫听这位"参谋"这样说，深信不疑，说：你老兄原来是廖师长的参谋，又是我们陈家人。早听说你老兄大名，你为廖师长出力不少啊！我表哥还经常夸你们。要搭我们的船没问题。近来游击军到处活动，我们一道会更顺利些。船一起程，陈文甫让勤务兵拿来了酒菜、三杯下肚，冉南轩故意将一个士兵一靠，这士兵便掉进河里（实际上这是动手的暗号），大部敌人都忙着去拉掉进河里的士兵，却不料当官的背心上都顶上了枪口。陈文甫企图反抗被冉南轩同志一枪撂倒，余下的人均放下武器，埋伏的游击军也冲了出来。这个伏击打得相当漂亮。大大鼓舞了游击区的群众。

川东游击军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部队到这时又发展到六百余人，并建立了根据地。

## 川东游击军迅速发展和改编为红三十三军

三二年十月至三三年一月这段时期，红四方面军先后解放并建立了通、巴、巴红色根据地，川东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红军入川并打败田颂尧的消息在游击军和广大群众中不胫而走。广大受压迫的人民无不天天盼红军，群众自发地买了鞭炮，做了红旗，准备迎接红军，川东游击军在川东党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抓住大好时机，开展广泛工作，不

久，游击军扩大到二千余人，并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到三三年夏，全军已发展到六千余人。

三三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宣达战役，迅速解放了万源、宣汉、达县三城广大地区。而刘存厚的廖雨辰师被红四方面军击溃后，在宣汉的南坝场又被我川东游击军包围达一星期之久。川东党派联络员赵明恩同志将这个情况报告了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到主力红军的支持，最后将这部分敌人全部歼灭。

川东游击军与主力红军会师后，在解放了的宣汉城内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在这次会上，徐总正式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原川东党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同志任军长，原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任政委，后又调罗南辉为副军长，原有的三个支队加上南坝、宣汉城郊及西北地区、达县等地的游击队合建三个师：红九十七师，师长蒋群麟；红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红九十九师，师长王波，全军一万六千余人。从此，这支工农群众武装就正式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川东游击军从诞生到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经过四年半的艰苦历程，它紧密地依靠群众，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自己的任务，坚持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中间虽也走过弯路，受到挫折，但游击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党、对人民始终是忠心耿耿的，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在敌人不断围攻的严重情况下，前赴后继，坚持斗争，在川东地区举起革命火炬，对发展四川的革命斗争、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四方面军的迅速发展以及整个中国革命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我南下入川的经过和初到绵阳的一些观感

赵继英

一九四八年的九月七日至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三十一日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了优势的兵力，在夺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解放了东北全境。从此使东北、华北、中原、华东、西北等五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村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作出了迅速夺取全国胜利，把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的决议。通过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传达学习，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早日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二中全会前后，胜利消息从四面八方不断传来：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我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二十多年的南京；二十四日华北人民解放军和西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五月底华北全部解放；五月二十日西北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安。在我军不断胜利，蒋军接连败退的胜利形势下，解放区的人民勇跃参军参战，各级干部纷纷要求到新的解放区去工作。山西临县是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大县，从四九年春天开始先后抽调四批干部去支援新的解放区

工作。我是第四批抽调出来的干部，这批被抽调的干部共四十余人，是根据上级要求，由离石中心县委管辖的离石、临县、中阳、方山四县抽调一百五十名干部组成能接管一个县的领导班子，准备到即将解放的甘肃省去工作。一九四九年的九月九日我们从临县出发，十一日到达中心县委所在地离石集中。由中心县委把四个县的外调干部编成了一个队，由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照业，临县县委宣传部长薛青，中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白汝光等三同志带队。在我们出发之前中心县委为我们召开了欢送大会，中心县委书记阎昭同志讲了话，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生活用品，我们于九月十四日从离石出发，经过九天的行军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达了晋南行政公署所在地临汾。我们这批新来的干部驻到临汾附近的襄陵县城，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已集中了从晋绥边区抽调来的干部四、五千人，在这里办了一个党校，集中学习党对新解放区的有关政策，我们这批新抽调来的干部被编为新一部。我们在襄陵时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印发的有关新解放区党的基本政策的四十四个文件。过去由于我们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下，多数干部都没有住过党校，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中央的重要文件，所以每个同志在学习中是非常认真的。大家知道学习好这些文件是将来搞好新解放区工作的关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传到临汾，我们个个都万分高兴，热烈欢庆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欢庆我们党浴血奋战几十年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正在这大喜大庆的时刻，贺龙、胡跃邦

等领导同志来到临汾，并在临汾城内的小飞机场召开了入川动员大会。会上贺龙、胡跃邦同志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号召大家要到大西南去，解放正在国民党统治下受苦受难的西南各族人民，动员大会后组织了讨论，在讨论中大家感到很突然，因为我们在临县出发的时候，县委书记董如元同志向我们说的是到甘肃去，现在怎么一下就要叫我们到四川去呢？大家听说要到四川去就纷纷议论，并产生了很多的思想顾虑。因为我们干部中绝大多数人员是农民出身，乡土观念、家庭观念都比较严重，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庭太远。四川在我们那里的人们都认为是很遥远的地方，到那里去工作人生地不熟，加之那时的交通又不方便，认为去了就难以回家了。后来经过领导的反复动员，强调解放全中国人民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作为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每个共产党员的最高职责。共产党员要识大体，顾大局，听从党的召唤。经过十几天的热烈讨论，绝大多数的同志都表示要以革命工作为重，服从上级的分配，为解放西南各族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很多同志都向组织写了决心书。但是，也有个别胆小怕死，怕困难，家庭观念严重的人当了革命队伍中的逃兵。

在搞通思想的基础上，迅速地进行了入川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便于在新解放区开展工作，贺龙司令员决定南下干部一律实行军事化的建制，把整个南下干部编为梯队、大队、中队，我们被编为四梯队，四大队的二十六中队。每个干部还填写了入伍登记表，并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规格，发了服装和部分武器弹药。在组织整编

后还进行了短期的军事训练。学习了队型站列，投弹射击，站岗放哨、命令传递、口令对答、紧急集合等基本军事知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我们开始了向大西南进军的征途。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跟随十八兵团进军四川，要一边打仗，一边接管，所以就决定把不能适应行军打仗的一批女干部和年龄较大，身体不大好的同志暂时留到临汾。我的爱人吕桂英同志本来是和我一道外调的，在外调前她是临县四区的妇联副主任，那时才二十岁，身体很好，她要求和我一道走，但组织上没有批准，所以她就只好暂留在临汾。

一九四九年中秋节之后不久，我们南下的干部就开始出发了，襄陵城内的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我们。暂时留在临汾的女同志也为我们来送行。她们每个人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来为她们的同志、战友、亲人告别。因为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我们队伍中同志的伴侣，在此时此刻伴侣双方都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来离别的。男女双方都在想着我们今天的分手是暂别还是永别呢？因为我们跟随部队入川是奔赴战场去和敌人进行生死的搏斗，每个人都面临着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性。所以今天的离别也可能是永别。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四川各族人民的解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作出个人的牺牲来服从人民的需要。后来的事实告诉了我们，同我一起入川的几个同志就在剿匪和征粮工作中壮烈牺牲了，这些同志的家属接到的第一封信就是不幸的噩耗。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当初和我一起来川的薛青、李孝民、杜世生、武久新、王生明、刘福宇、马成江、刘荣进等十多个同志已先后牺牲和病故了，这些同志为四川人民的解放，经济建设出过力，我们每个活着的同志都应该怀念他们。